

马邑文化系列丛书

主编：郭连厚 刘彪

执行主编：熊国章

马邑与马

熊国章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三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邑与马 / 熊国章著 / 太原市：三晋出版社，2008

（马邑文化系列丛书

主编：郭连厚 刘彪 执行主编：熊国章）

ISBN：978-7-80598-901-3

定价 70.00 元（全 10 册）

【主题词】地方史

【中图法分类号】K292.54（历史、地理＞中国史＞地方史志）

【内容提要】 本书试图在大的历史背景与文化背景之下，阐述马邑所走过的历史进程，并试图探讨马邑与马的历史渊源。内容包括黑驼山下“猎马人”、马邑自古多马、人们心中的马邑等。

【参考文献格式】熊国章著．马邑与马．太原市：三晋出版社，2008.

引言

关于“马邑”，《辞海》作如下解释：

①古县名。(1) 秦置。治今山西朔州市朔城区。西晋永嘉中废。西汉初为韩王信都，既而为匈奴所攻取。后还属汉。元光二年（公元前 133 年）汉伏兵马邑旁，欲诱致匈奴邀击之，单于既入塞，谋泄，引兵还。史称“马邑之谋”。(2) 唐开元五年（717 年）置。治大同军城（今朔州市朔城区东北）。金贞祐二年（1214 年）升为固州，元复旧。清嘉庆元年（1796 年）废入朔州。唐建中时，曾为朔州治所。②郡名。隋大业三年（公元 607 年）改朔州置。治善阳（今朔州市朔城区）。辖境约当今山西宁武和恒山以北，黑驼山、洪涛山、左云以东地区。唐武德四年（621 年）复改朔州。天宝、至德时，又曾改朔州为马邑郡。

唐代诗人韦应物的《突厥三台》中有如下诗句：

“雁门山上雁初飞，马邑阑中马正肥。”

这本小书，试图在大的历史背景与文化背景之下，阐述马邑所走过的历史进程，并试图探讨马邑与马的历史渊源。这是地方历史文化研讨中的一个话题，希望这本小书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熊国章

目 录

引 言.....	1
一、黑驼山下“猎马人”	1
二、马邑自古多马.....	7
三、人们心中的马邑.....	11
四、尉迟恭擒龙马.....	17
附录：马文化漫谈.....	19
主要参考文献.....	38

一、黑驼山下“猎马人”

天地造化，钟灵毓秀，人为万物之灵长。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把从猿到人的漫长转变过程分为“攀树的猿”、“正在形成中的人”、“完全形成的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 508——512 页）这样三个阶段。后来人类学家又把“完全形成的人”的进化过程分为猿人（直立人）、古人（早期智人）、新人（晚期智人）三个阶段。在我国，考古发现的“猿人”主要有距今 170 万年的元谋人、距今 110 万年和 65 万年的蓝田人、距今 60 多万年的北京人、距今 30 万年的金牛山人等；发现的“古人”主要有：马坝人、长阳人、丁村人、许家窑人等，他们距今 20 万年至 10 万年之间；发现的“新人”主要有河套人、峙峪人、山顶洞人等，他们距今 5 万年至 1 万年之间。

……我们所有探寻的终结，将来到我们的出发之地。

在朔州这块古老而神奇的黄土地上，有人类活动的历史，至少可以上溯到距今 3 万年左右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峙峪人”。这是我们迄今所知的朔州在历史黎明前最早的人类。因他们主要靠猎取野马等草原动物为生，所以史称“猎马人”。

“猎马人”在体质形态上，已经和现代人相似；在社会组织上，已经进入母系氏族公社初期。

●在出土的动物化石中，马类动物占到了食草类动物的 90% 以上，初步统计至少有 120 匹野马，88 头野驴。

●峙峪遗址中发现了我国迄今所知时代最早的一枚石箭头，说明“猎马人”已经发明了弓箭这种前所未有的武器。弓箭的出现，使人类捕食猎物、保护自己的能力和能力明显增强，表明人类面对大自然的心态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

●遗址中还发现了一件用石墨磨制的钻孔装饰品和许多具有明显刻划痕迹的兽骨片。可见“猎马人”已经有了初露端倪的审美意识和数量概念。

●远古的事情谁知道呢？石头是惟一的见证。峙峪文化是北京人文化与华北新石器时代细石器文化的联系环节之一，为亚洲、美洲细石器文化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1963 年夏初，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山西工作组王择义、尤玉柱等，根据西安矿业学院煤田普查队提供的线索，在山西朔县（今朔州市朔城区）峙峪村附近发现了一处颇有意义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即后来命名的峙峪遗址。随后有关部门对遗址进行了为期 50 天的发掘工作，获得晚期智人的枕骨一块、石制品 15000 余件、石墨制的钻孔石坠

（装饰品）一件、哺乳动物的牙齿 5000 余枚、许多烧石和烧骨以及大量被人工击碎的兽骨片。

峙峪村位于大同盆地西南朔州黑驼山东麓，桑干河上游的支流峙峪河绕村而过，西、北、南三面由群山环抱，东面是广阔的桑干河平原。遗址就在峙峪河与小泉沟汇流处的一个孤立的岛状沙丘中。

在我国旧石器时代地点当中，石器、动物化石等材料如此集中的遗址还是为数不多的。值得注意的是，沙丘的底部存在着呈透镜状分布的灰烬层与周围的石块（很可能是砸击动物骨骼或架木燃火的垫石）所构成的遗迹。种种遗物、迹象表明，峙峪遗址是一处原始人类的集体营地，反映了旧石器时代晚期“猎马人”在干凉草原地区的生存情况。

动物化石绝大多数埋藏在遗址的文化层中，在文化层下面的砂层底部也发现了极少量的动物化石，如虎、披毛犀、野马等。化石密集成层，一般保存情况较差，未见头骨，下颌骨多残破，见到的大多数是单个的牙齿和被击碎的骨片。

通过对动物化石的综合鉴定得知：在峙峪动物群中有蹄类所占的比例最大，种类上占 70%，数量占 95% 以上，构成这一动物群的主要部分，其中典型的草原动物有蒙古野马、野驴、普氏羚羊、鹅喉羚等。

在我国，蒙古野马最早的化石记录见于丁村遗址。据现代动物地理资料，蒙古野马是一种喜冷的草原动物，分布在阿尔泰山以南、天山以北的准噶尔盆地及玛纳斯河流域，沿乌伦古河向东分布到北塔山附近以及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科布多盆地，较我国更新世晚期的分布区的已知南界（襄汾丁村）在纬度上北移了 9 左右，年平均气温相差约 10℃。

根据动物群的性质分析，峙峪遗址的地质时代应属于更新世晚期。峙峪人当时的生活环境是草原与灌木草原地带，气候比现在冷一些，且较为干燥，冬夏的温差相当大。在这种环境下，“峙峪人”维持生计的主要手段只能是狩猎，峙峪遗址中发现大量的动物骨骼便是有力的证据。

对峙峪遗址动物化石的研究表明，马类动物占到了食草类动物的 90% 以上，初步统计至少有 120 匹野马，88 头野驴。如此众多的马类动物化石发现于面积不大的发掘范围

内实属罕见，显然这些野马、野驴并非自然死亡。考古学者们断定，“峙峪人”的认识能力和狩猎水准已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他们在长期的狩猎活动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已懂得根据兽类生存情况，较集中地捕猎一、两种动物。贾兰坡先生在发掘报告结语中称峙峪一带的原始人类为“猎马人”，后来郭沫若先生在《中国史稿》中也沿用了这一说法。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在峙峪遗址中，发现了我国迄今所知时代最早的一件石镞。可以推

断，“猎马人”已发明了弓箭，这是前所未有的武器，等于把手延长了几十米，在当时来说是最有威力的狩猎工具。弓箭使狩猎的范围扩大，提高了捕猎的效率，从而促进了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峙峪石镞以燧石为原料，用非常薄的长石片制成，前锋锐利；一侧边缘经过很精细的加工，另一侧保持石片原有的锋利刃缘，只在靠近尖端的部分稍加修理，以使尖端更为周正；与尖端相对的底端左右两侧均经加工而变窄，状似短短的镞铤。如此典型、精致的石镞，在我国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存中尚属首见。

我国古代传说羿为颛顼的后裔，以善射著称。又有“羿射九日”的神话，赞美羿的伟绩。于是后人就把弓箭的发明也归功于羿。比如银雀山汉墓竹简《孙臆兵法》的《势备篇》载：“羿作弓弩”。其实弓箭真正的发明时代，比传说中羿的年代更为久远。

经碳十四测定，峙峪遗址距今大约 28945 ± 1370 年，而从石镞的加工精细程度看，人类最初使用弓箭的时代，还要比这早一些，至少在距今 3 万年以前。

原始弓箭是用竹木制造的，极易腐朽，很难完整保存至今，所以在考古发掘中往往只能见到镞，而见不到弓。

就弓箭的基本结构来说，虽然只有弓、弦、箭三部分，但是其中包含的技术知识却相当丰富，不仅涉及多种材料的选定、多种方式的加工和多元联结的技术，而且还有一定的弹力形成和箭体飞行等方面的知识。因此，弓箭的制造技术是原始社会人类经验和技能的结晶，是原始军事技术的最高成就。弓箭的出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正如恩格斯所说：“弓、弦、箭已经是很复杂的工具，发明这些工具需要有长期积累的经验 and 比较发达的智力，因而也要同时熟悉其它许多发明……弓箭对于蒙昧时代，正如铁剑对于野蛮时代和火器对于文明时代一样，乃是决定性的武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峙峪遗址出土的“斧形小石刀”，应是我国现知时代最早的一件打制石刀。该石刀用半透明的水晶制成，有宽约三厘米的弧形刃口，两平肩之间有短柄状呈凸形的突出。整个器型规整而小巧，精致而美观，以前在我国旧石器时代遗址中还未曾发现过这一类型的石器。考古学者推测，小石刀应为切割猎物之用。它在使用时很可能装有木柄或骨柄，与该遗址所出的石箭头同是我国早期复合工具的代表。

在峙峪遗址中还发现了我国称得上锯的最早遗物。这类“石锯”由刮削器发展而来，是把薄石片的一侧边缘修理成锯齿状刃口，敲击出来的刃缘比较均匀，刃口薄而锋利，当锯使用是很可能的。这类“石锯”既可以锯截，又兼作刮削之用，因此，考古学家在峙峪遗址的发掘报告中，称之为“单边刃刮削器”。历史文献和民间传说一直公认锯的发明者是春秋时

期的著名工匠鲁班，并将他发明锯的过程讲述得绘声绘色。其实这是由于锯的产生太久远了，史前时期又没有文字记载，所以后世的人们便将锯的发明归功于所能追溯的最早的能工巧匠身上，正如把找不到发明者的车船、房屋之类均推原到人文始祖黄帝一样。

在出土的文化遗物中有一件用石墨磨制的钻孔装饰品，这可能算是人类最早的艺术品。还发现一件骨制尖状器和许多有刻划条痕的骨片。“如果确属人工刻划的符号，那就使我们联想到传说文字发明以前‘结绳记事’、‘契木为文’，都不会是无稽之谈，而是人们实际生活需要的产物。”（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一册）裴文中先生高兴地说：“峙峪骨片表明中国旧石器艺术已初露端倪！”（《考古寻踪》，山西人民出版社）

贾兰坡先生认为：只有把峙峪遗址放在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系列中来观察，才可以充分理解它的意义。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至少有两个系统，其中之一是“匭河—丁村系”或称为“大石片砍砸器—三棱大尖状器传统”，其基本特征是利用宽大石片制造各类型的大砍砸器；另一个系统就是“周口店第一地点（北京人遗址）—峙峪系”（简称“第一地点—峙峪系”），或称为“船头状刮削器—雕刻器传统”，其基本特征是利用不规则小石片制作多种类型的细小石器。“第一地点—峙峪系”在华北分布很广，这个丰富多彩的文化系统是华北新石器时代的细石器文化的先驱。峙峪遗址的意义恰恰就在于它是北京人文化与细石器文化的联系环节之一，并为亚洲、美洲细石器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按照贾兰坡先生的说法，中国以及东亚、北亚和北美的细石器，总的来说属于同一传统。虽然可以把这一传统的细石器的起源，追溯到北京人时期，但和“中石器时代”及其以后的细石器文化最接近的却是峙峪文化。在峙峪文化的组合中不仅见到有在细石器文化中普遍存在的石镞、拇指盖状刮削器等，还有扇形石核。峙峪的扇形石核，虽说没有“中石器时代”及其以后的细石器文化中的典型，但已初具规模。在峙峪文化遗址中还见到代表细石器文化特征的石叶，这是我国所见到的最早的用间接法剥落的石叶。

“第一地点—峙峪系”石器传统是新石器时代华北地区狩猎型经济类型的文化产生的基础，是这一经济类型的人们对生产工具特殊要求的反映。在细小石器传统中，与狩猎有关的工具占主体，其经济生活当以狩猎为主，辅以采集。

从细石器文化在中国的地理分布，可以看出当时人们生活的大致轮廓。我国北部、西北部和东北古代的一些氏族，是以细石器为共同特征的。他们绝大多分布在沙漠草原或高山地带，最初过着以狩猎为主，以采集为辅的经济生活，从狩猎活动中逐渐学会了驯养畜群，产生了畜牧业；为了长期饲养畜群，需要储备饲料，于是又从采集发展出原始农业。在新石器时代特别是稍后的阶段里，我国北部地区广泛出现了细石器和石锄、石斧等农具的混合文化，

是亦猎（包括驯养家畜）亦农的标志。

●作为我国史前马文化的典型标本，黑驼山下“猎马人”的原始马文化，事实上已成为后世中国马文化的先声

如前所述，在峙峪遗址的动物化石中，野马最多，应是“猎马人”狩猎的主要对象。考古研究表明，当时峙峪一带的野马属于蒙古野马，其体形大小已经和现生的蒙古野马没有明显的差异。蒙古野马又称新疆野马或普氏野马，这是迄今为止惟一存活于世的野生马种。中国是野马的故乡。早在先秦时期，《逸周书》《尔雅》等文献典籍对野马就已有明确的记载。《尔雅》说，野马“如马而小，出塞外”。1879年，俄国探险家普热瓦斯基在新疆卡拉麦里山一带发现了野马，并获得四匹野马标本，后由沙俄学术界正式命名为普氏野马。1947年，蒙古国在其境内曾捕获一匹野马，故野马也有“蒙古野马”之称。

在亿万斯年的生物进化过程中，马是比人类资格更老的一种动物。马的历史比人类的历史要早五千多万年。但它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进入人类生活，则是较晚的事。“严格意义上的马文化，指野生马受人类驯化成为家马并为人类服役的历史文化现象；此前可称原始马文化或史前马文化。”（李元庆《马邑文化三论》）

毋庸置疑，人类的祖先与自然界中的马发生联系，最早应该是从狩猎开始的。在旧石器时代，人类只是把野生的马作为狩猎的对象，大概又经过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原始先民才懂得把野马驯化成为家马。马的驯化始自新石器时代。在被人类驯化以后的数千年中，马作为人类最忠实的伙伴和朋友，反过来，对人类的历史产生了莫大的影响。

在我国，虽然由于发掘到的材料比较稀少，还构拟不出一个马种起源进化的谱系，但是不少学者根据现已发现的马化石推断，中国既是世界马种的起源地之一，也是世界上最早开始驯化马匹的国家之一，我国的马是先民自行完成驯养的。

从史前到有文字记载以来，我国的原始先民和后来的历代祖先在与马共同创造华夏历史的同时，也创造了源远流长、异彩纷呈的马文化，与马有关的各种现象、习俗、观念等广泛地融入中华文化的各个领域。

我们有理由认为，作为我国史前马文化的典型标本，朔州黑驼山下“猎马人”的原始马文化，事实上已成为后世中国马文化的先声。正如“晋学”专家李元庆先生所言：“峙峪人制作的石镞，是我国远古人类发明弓箭的历史肇端；峙峪人对野马等动物生存状况和生活规律的初步观察与掌握，可以说已经是人类驯化野马，使之为人类服役的历史先兆了。”

这就为中国马文化的形成创造了历史前提，提供了历史依据，“所以，峙峪人的原始马文化事实上构成中国马文化的历史渊源。”（《马邑文化三论》）

● “从古到今，我一直存在，并将永远存在下去，直至千秋万代。”“猎马人”这样告诉未来……

● 萧萧马鸣，凿凿化石；千古发祥，万世福祉。未来将会永远感谢“猎马人”，感谢马，感谢我们脚下这片蕴藏着特殊机缘和能量的黄土地……

二、马邑自古多马

騊駼野骏，产自北域。交颈相摩，分背翘陆。

——[晋]郭璞《騊駼赞》

马文化对朔州历史文化所产生的影响是源远流长的。

在朔州这片蕴藏着特殊机缘和能量的黄土地上，最早的人类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猎马人”，最重要的早期城市是比基督纪元还要早二百多年的秦马邑。毫无疑问，从“猎马人”到“马邑”，这已成为朔州历史深处的一道以“马”为媒、续往启来、人马相彰、奇特壮美的风景线。

作为行政区域，马邑的历史要比朔州古老得多。“马邑”，这个古老的地名，历经两千多年沧桑嬗递，一直沿用至今，这在今朔州之地乃至全国也是罕见的。从方輿角度看，秦马邑县境域固然不比今之朔州大，但隋马邑郡就比今朔州之地域广。鉴于上述理由，故本文在命题时特以历史影响久远、文化底蕴深厚、知名度颇高的马邑作为今朔州之地的总称谓。

●古马邑所在之地自古多产良马，是我国塞北产马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雁门关则为塞北马种入口地。通过民族之间的贸易互市、频繁战争和人口迁徙，这一地区的大量马匹自周、秦以来不断传入中原

●民间传说，古马邑城循马蹄迹而建，这匹出自马邑的通灵野骏，后为秦大将蒙恬所获，献与始皇，号曰“追风”，列为“七骏”之首

●相传北魏末“尔朱荣送‘毒龙’送天下，高欢得‘毒龙’得天下”。此“毒龙”乃朔州所产名马

●据记载，朔州“有池名金龙。旧传二龙出，化为马，马以龙故，腾骧莫能制。尉迟敬德氏跨之，崛起山后，为李唐名将。”（《万历马邑县志》：王日新撰《建金龙池卷棚记》）

春秋战国时期，句注山（雁门山）以北一带地区一直是若干戎狄部落游牧杂居的乐土。正如司马迁在《史记·匈奴列传》中所说：“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各分散居溪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意思是：晋国北部有林胡、楼烦等戎族……各自分散居住在溪谷里，都有自己的酋长，常常相聚在一起的竟有百多个戎族部落，但都不能相互统一）

《左传·昭公四年》有“冀之北土，马之所生”的记载。冀即冀州，是古九州之一。《尔雅·释地》说：“两河间曰冀州。”郭璞注：“自东河至西河。”即主要包括今河北、山西两省

地，这大致是一个自然区域的概念。“冀之北土”大体指今河北、山西二省北部一带，理应包括今朔州之地。这一带有古就是产马之地（即“马之所生”）。

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北破林胡、楼烦之后，今朔州之地属赵国的雁门郡。据《史记·匈奴列传》载：“武灵王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置云中、雁门、代郡。”

战国时人们每每称道代马，《战国策·秦策一》载苏秦说秦惠王，即提到“北有胡貉、代马之用”。代本古国，公元前476年为赵襄子所灭，其置郡在赵武灵王时。既然代地多产良马，那么，当时与代地毗邻交错的雁门郡一带也当为良马主产地。

相传秦始皇时大将蒙恬率秦军北击匈奴，曾在这里筑城养马，从此便有了“马邑”这一古地名。还有说，“秦时建城辄崩，忽有马周旋驰走反复，后随马迹筑之，城乃成，遂名马邑”；并且传说，这匹出自马邑的通灵野骏，后为蒙恬将军所获，献与秦皇，号曰“追风”，列为秦始皇“七骏”之首。《古今注》云，秦始皇有名马七：追风、白兔、躡景、奔电、飞翮、铜爵、晨凫。如果说地名是一种文化积淀的话，那么“马邑”这两个字的背后则聚集、隐藏着异常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至少我们通过这一古老的地名，可以想象到当时秦王朝养马业的发达。不少论者认为，秦始皇之所以能击败群雄，统一华夏，竟同他的祖先及其嬴姓族擅长养马有直接关系。训练有素的良马骠骑，无疑加强和提高了秦军的战斗力。

西汉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划分全国的经济区域时曾指出一条农牧分界线：由龙门至于碣石。碣石在今河北省昌黎县南濒海之处，龙门则在今山西河津县与陕西韩城县之间。这是一条由东北斜向西南的曲线，始自碣石山下，沿今燕山南麓，越过太行山，再经今太原市北至于汾河上源，循吕梁山而至于黄河侧畔的龙门山下。这条界线其西其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史记·货殖列传》），当为战国以迄秦汉时期的畜牧区域，或农牧相杂的地区。而隶属于雁门郡的马邑县正在司马迁所指出的分界线之西北，作为养马地区是显然可见的。

还在秦时，就有班壹避地于楼烦从事畜牧，“致马牛羊千群”（《汉书·叙传》），直到汉初，班氏还“以多财而为边地之雄豪”（《汉书·叙传》，颜师古注）。汉武帝初年与匈奴用兵时，曾设“马邑之谋”，使马邑人聂壹以佯卖马邑城为饵，引诱匈奴单于率军入塞，直至马邑附近，单于看到畜群遍布四野，却没有牧人管理，于是产生了怀疑（《史记·匈奴传》）。马邑和楼烦相去不远，当地居民生产的情形无疑是相同的，可知这一带的人们素来是从事畜牧生涯的。

直至北魏末年，籍隶北秀容的契胡族酋长尔朱荣，论其家计，竟“有马十二谷，色别为群”（《北史·齐高祖神武皇帝本纪》）。尔朱氏所居北秀容的梁郡城，就在今朔州市朔城区西

北，可见当时这一带的畜牧仍然超过了农耕。史载，尔朱荣的父亲尔朱新兴为酋长时，“朝廷每有征讨，辄献私马，兼备资粮，助裨军用”，做官后，“每入朝，诸王公朝贵竞以珍玩遗之，新兴亦报以名马。”（《魏书·尔朱荣传》）

北齐王朝的开拓者高欢在未发迹之前，曾投附北秀容的尔朱荣。“有澄清天下之志”的高欢是因替主人剪拂一匹常常蹄啮伤人的悍马而受到尔朱荣青睐的，“自是每参军谋”（《北史·齐高祖神武皇帝本纪》）。

传说这匹悍马胸项间有恶旋一丛，故此作孽，号为“毒龙”。尔朱荣曾几次使人剪之，毛不能去，反为所伤害。高欢自告奋勇前往厩中剪马。“毒龙”一见栏开，双蹄并起，挣断铁索，奔出厩外，咆哮腾炮，众人无不悚惧。高欢上前喝道：“你虽畜类，亦有性灵，既受豢养，自当任人驾驭，何得蹄啮杀人？我为你改恶为良，来日立功报恩，方显尔能。”“毒龙”听了，顿时收威敛迹，伏地低头。高欢贴近“毒龙”，不加羁绊，剪去旋毛。已而起曰：“御恶人亦如此马矣。”尔朱荣惊喜异常，说：“此马即以赐卿，卿为我试之。”高欢飞身上马，风驰电掣般周旋驰走了几遍，忽见有旗杆竖在百步之外，高欢即取随身弓箭，连发数矢均中杆上，众皆喝彩。

高欢后来凭着异乎常人的机变巧诈，窃取六镇起义果实，逐步成为北魏末年政治舞台上烜赫一时的风云人物。因而后世便有“尔朱荣送‘毒龙’送天下，高欢得‘毒龙’得天下”的传说。

隋唐时期，农牧地区的分界线基本上仍保持司马迁所说的碣石龙门一线及其延伸线的旧规。

据《新唐书·兵志》载，唐代在河东（今山西省）的岚州设有牧监，“统楼烦、玄池、天池三监”，马产甚蕃。而与岚州北部接壤的朔州无疑当为养马之地。尔朱氏家世破灭之后，其地（北秀容之地于唐时隶于朔州）仍当延续旧俗，以牧畜为要务，不至于很快就改牧为农。唐代在北边设马市，贡马有的甚至来自贝加尔湖一带。唐玄宗时，与突厥互市，因大量买进马匹，“于河东、朔方、陇右牧之”（《新唐书·兵志》）；岚州既有牧监，而要在河东放养马匹，就应在岚州及其邻近地区，特别是像朔州这样宜于牧畜的地区。

《朔州志》（康熙残本）卷二记载：后魏以来，州东北金龙池“有二龙，时化为马，一骊一黄，天阴晦每出民间，牝马遇之，生驹神骏”。传说，当地有一位勇武过人的铁匠，潜伺龙池旁，待龙马出现，跨而制之，收为坐骑。后来这位打铁出身的英雄骑着龙马驰骋沙场，为开创大唐基业立下赫赫战功。他就是千百年来被老百姓奉为守户神的一代名将尉迟恭。

据以上记载和传说，我们可以推断，在隋唐时期，朔州地区尚有野马生存，而野马频繁

出没的地方必定林茂草丰，可想而知，当时桑干河上游的森林植被状况还相当优越，那流淌在历史深处、美丽给我们看的金龙池，曾有过多少值得骄傲的春秋啊！

辽、金、元时期，察哈尔草原及其邻近区域都是主要养马地。朔州地区的农业生产和封建制度虽然已有长足的发展，但由于这个地区长期受北方游牧民族政权的统治，畜牧业在整个社会经济中仍占有重要地位。与生活环境、习俗等有关，这一带人普遍崇尚武勇、娴于鞍马骑射。元代牧场极其广阔，所有水草丰美的地方都用来放牧马群，早已打破了“国马牧于北方，往年无饲于南者”（《元史·英宗纪》）的界限，这是在以前任何朝代都不可能做到的。今朔州市朔城区的西套村一带，在元代为军马牧场，当地人谓之西套；马营堡村在元代为官兵圈马之地，故原名马圈头，清朝改马圈头为马营堡。立此存照，以见元代朔州地区养马业之一斑。

明清时宣化和大同等边塞重镇每年从塞外市马定额达三、四万匹，并听任民间在边塞自由贩马。大同镇边马市始立于正统三年（1438年），后来由于明朝同鞑鞑、瓦剌经常发生战争，马市时开时罢。据清代《云中郡志》记载，在明代，今朔州境内紧靠北边的杀虎堡、威远堡、破虎堡、铁山堡、迎恩堡均开设过马市。另据资料统计，仅右玉县杀虎口的马市，隆庆五年（1571年）交易马二千零九十六匹，六年（1572年）二千三百七十八匹，万历元年（1573年）达三千七百八十八匹，万历二年（1574年）竟增至七千六百七十匹（《呼和浩特文史资料》第五辑）。但是，总的来说，明清以来，因社会经济条件与生态环境的变化，全国范围内包括朔州地区的养马业均趋于衰落，马匹数量显著减少。

新中国成立以后，1956年，山西省畜牧厅在朔县南部麻家梁一带兴建颇具规模的国营种马场，引进苏联重挽马等品种，进行纯种繁殖和本地马的改良。“文革”期间，马场一度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原华北农垦兵团某部接管，1969年以后改为国营山西省雁北地区红旗牧场。此为后事。

●“雁门山上雁初飞，马邑阑中马正肥。”我们现今获得的一切都来自历史。“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50页），包括永远的马邑，永远的马……

●马，永远在我们心中……

三、人们心中的马邑

史学理论告诉我们，历史分为本体和认识两个方面。历史的本体是客观的，它一旦被创造出来，就成为一种独立的和外东的东西，就无法逆转；而历史的认识则是主观的，是丰富多样并且不断发展变化的。

从历史的本体角度言，历史上中国北方的边陲重镇——马邑古城，事实上是我国古代战争的产物，是中国古代养马业和马文化发展的历史产物，这是不以人的意志和行为为转移的历史存在。是马驮着马邑城向我们走来。

从历史的认识角度言，历史的马邑和马邑的历史只潜存于既往的一些文献典籍，更主要是存在于人们的记忆和思考之中，回荡在现代人的心中。

虽然马邑和马的辉煌已经成为过去，但是其历史文化信息不仅从未中断，而且已经或正在化为一种精神基因，渗入了我们的肌肤，融进了我们的血液。

- 马邑之名的由来，有两种说法
- 马邑城的传奇富有隐在的象征意蕴和深刻的启示力
- 在“秦人依马迹以筑城”的传说中，极有可能埋藏着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
- 我们对这个世界，知道得还实在太少
- 在历史的苍茫中，马邑和马一同成为奇迹

古马邑城是今朔州境内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城邑之一。马邑作为城市的名称，最早见载于司马迁的《史记·高祖本纪》：汉高祖七年，“匈奴攻韩王信马邑。”

马邑之名的由来，传统说法有两种：一说，秦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蒙恬率大军北击匈奴，秦军在今朔城区城关一带筑城养马，马邑之名始此；另一种说法源于晋代干宝的《搜神记》，“秦时筑城于武周塞内以备胡，城将成而崩者数焉。有马驰走，周旋反复，父老异之。因依马迹以筑城，城乃不崩。遂名马邑。”

通常人们认为，前一种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历史原貌，后一种则是虚而无征的事情。

值得注意的是，后一种说法固然有荒诞不经之嫌，却反倒流传久远，影响广大。就连《后汉书注》、《水经注》、《史记正义》等颇为著名的文献典籍，也都要援引《搜神记》中有关马邑城的传说记载。又《太平御览》卷一六三引《晋太康地记》，也有类似的文字：“秦时建此城辄崩不成，有马周旋驰走反复，父老异之，因依以筑城，遂为马邑。”

这个古老的传奇之所以每每令人遐思不已，就是因为它富有隐在的象征意蕴。

这里的“马”，既是战争破坏冲击之力的象征，又是民族融合凝聚之力的化身。“有马驰

走一地”，象征着承载战争的马邑古战场；“周旋反复”意味着战事频繁不断；马迹是文明积累和社会进步的象征。而城堡乃是人类跨入文明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这点已为学术界所公认。

古代的马邑，地处通塞中路的咽喉部位，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一直是中国土地上民族冲突与融合最激烈、最频繁的地区之一。战争孕育了马邑，也孕育了政治变革和社会开放；经济、政治的争夺，促进了民族的融合，更促进了文化的交媾。如果说，战争是实现民族与文化大融合的一种暴烈形式，那么，马邑的历史其实就是这样一部“得失常相伴、正反乃能合”的战争史。

古马邑城的传奇给我们的启示是深远的。我们不能不为它所通达的境界与深藏的蕴涵而感到惊讶。

当然，我们还可以认为，这个千古传奇也许本来就是古人的一个梦。假若是这样，我们则宁愿相信，这是当年北击匈奴的秦军统帅蒙恬或其麾下督建马邑城的将军曾经做过的一个梦，一个有着某种历史事实做为背景的梦。

传说是历史的投影，是对历史现象特殊的观察角度与评价方式的产物。在“秦人依马迹以筑城”的传说中，极有可能埋藏着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马邑城创建伊始，勘址规划工作曾因某种变故或失误而几经周折，以致屡易城址，旷久难成。

至今，在朔城区古城西南方向，仍有一对姊妹村庄，分别叫前留城村与后留城村。相传最早要在这一带建城，已运去石料，后因城址变更，将石料运往新址，于是原来的地方得名留城村。由于世事久远，其虚实现已无从确凿深稽，谨此顺带一叙。

古代勘选城址，有尝水称土之说，对水质的甘苦涩加以品尝，通过测试土质的轻重来决定宜与不宜选址建设。更何况观形察势于山川浩茫之间，远者数百里，近者几十里，可想而知，风水勘踏原非轻易之举。如此推断下来，秦人辗转走马看风水，应是情理中事，其历史消息竟在古老的传奇中得到了微妙的印证；所谓“有马周旋驰走反复”，此中不可思议之处，自不难窥破。

一位当代学者在一篇文章中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对这个世界，知道得还实在太少。无数的未知包围着我们，才使人生保留进发的乐趣。当哪一天，世界上的一切都能明确解释了，这个世界也就变得十分无聊。人生就会成为一种简单的轨迹，一种沉闷的重复。因此……应该理会古人对神奇事端作出的想象，说不定，这种想象蕴含着更深层的真实。”（余秋雨《洞庭一角》）

对“秦人依马迹以筑城”的传说，我们不妨也应作如是观，且信古人言之不谬，至少在

现代科学还不能做出解释之前，应该这样。况且，我们怎能以为现代科学就是全知全能的呢？我们怎能说人类一定要比其它动物“聪明”多多呢？我们怎能轻率地就否认那匹“周旋驰走反复”的马不具有超乎寻常的特异功能呢？事实上，至少马的嗅觉和听觉能力的上限是要远远超过人类的。成年马对走过一次的路途就能记住，经久不忘，故有“老马识途”之说。古希腊哲人柏拉图曾预言，我们看不到实在，我们看见的只是实在的影子。而德国哲学家卡西尔说得更好，“有多少种不同的生物体，实在也就具有多少种不同的组合与样式。可以说，每一种生物体都是一个单子式的存在物：它有它自己的世界，因为它有着它自己的经验。在某些生物种属的生命中可以看到的一些现象，并不就可以转移到其它的种属上去。”（[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

然而，不管怎么说，有一点可以肯定，古马邑城是古代战争、军事乃至马牧业的产物，今朔州市的历史渊源与马紧密相关，“马”，确实是朔州历史文化的一个闪光点。

● 尽管秦汉马邑城在地面上的遗迹早已泯灭了，但它的历史信息却施于万世而不绝……

● 秦汉马邑城的具体位置究竟在哪里

● 这里正是至少有着两千二百多年建城史的朔州市的源头

往事越千年。秦汉马邑城在地面上已无迹可寻。然而，它确实又是一个不容我们忽视和回避的存在。因为它潜存于永不泯灭的文化之中。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朔州古城周围一带的考古发掘和研究，不仅为秦汉马邑城的地理位置和建筑年代提供了重要线索，而且初步揭示了马邑城在秦汉四百余年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面貌。

据说，平朔考古队在朔州古城周围先后发掘战国、秦汉墓两千三百余座。而在朔州古城内建设征用的空地上，经大部分地下钻探，却未发现元代以前的墓葬。从挖开的地基看，文化层为二至四米。最下层为战国末至秦汉时期的文化层，发现的器物有砖、瓦、陶瓷等；上面的文化层，属于北朝至元代时期，除发现有砖、瓦、陶瓷外，还有铜钱、生活生产用具和房基、水井、窖藏等遗存。据此可证实，战国晚期至秦，这里已有居民聚落或城存在。北齐以后的城，均应是在此基础上改建、加固而成的。

考古学专家黄盛璋先生根据部分出土随葬器物的铭刻文字考证，在朔州古城周围有不少古墓葬属战国晚期赵人墓，这说明古城之地在战国晚期必有聚落居民。（参见黄盛璋《朔县战国秦汉墓若干文物与墓葬断代问题》）

在出土的大量随葬陶器中，发现二十三件陶壶的颈部有“马邑市”戳记陶文，戳记字形为秦汉篆书，可知这些陶壶都是秦汉马邑县官府窑场的制品，由此推知，这一带的墓地应与